

容易陷入環境決定論的嫌疑；在涉及社會文化時，作者曾用「同質」等詞語來劃分和提取不同的社會文化樣本，這多少類似類型學的表述與理解。此外，對於插花地共同體的身份認同問題，本書以吳氏先祖入住地湖為討論中心，旨在探討地湖人身份建構背後的社會性與能動性。在這些饒有趣味的民族志個案中，隱藏着一條由婚姻、家庭、親屬關係而至探究社會事實的主線，那麼，關於地湖婚姻、家庭與親屬關係的締結與伸縮勢必也影響着插花地的形成、分裂與重組。因此，由婚姻家庭與親屬制度所延伸出來的人群互動及社會關係問題來探討插花地仍存在很大的學術空間。

最後，關於文獻資料和田野民族志背後不同主體及文化實踐的選擇問題。本書所關注的主體是志史文獻資料背後的國家及精英和生活於插花地的鄉民，它們實質代表中國「金字塔」式政治結構體系的兩極，作者抽取頂端和底層，遮蔽中間，並且將這兩端的主體能動性簡化為國家制度精心設計的範疇或地方社會能動意識的結果。由此，圍繞插花地的存續構成國家與地方的文本。除國家明確的律令和地方社會的能動性外，對於那些有志於經營帝國邊疆的官員以及試圖從中獲利的鄉紳等地方精英或者近現代介於國家與基層之間的地方官員而言，插花地成為他們爭取國家資源的平臺，其間的博弈與互動在某種程度上影響着插花地的存續與興廢，但遺憾的是未能被置放到一個明確的層面上來討論。

王金元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凱里學院

錢晶晶，《歷史的鏡像：三門塘村落的空間、權力與記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330頁。

作為清水江研究範式的實踐成果之一，《歷史的鏡錫像：三門塘村落的空間、權力與記憶》一書是基於《木材之流動：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區的市場、權力與社會》一書所勾勒出的清初以來清水江流域區域社會綜觀式歷史過程圖像而進行的沉浸式村落田野研究。作者錢晶晶宣稱，「本書仍是立足傳統人類學視角下的整體觀的村落研究，致力於在對村落的地理概貌、經濟生活、社會組織、宗教信仰等文化範疇的各方面進行結構性的總體把握的基礎上，解釋人們日常生活表象之下深層的文化象徵意涵」。（頁6）

三門塘是清代以來清水江下游木材貿易的重要交易點，隨着商業經濟在區域社會乃至村落生活的滲透，三門塘村落的家族譜系、觀念意識、歷史記憶、社會組織、性別、儀式等諸多層面，留下國家意識形態、區域市場網絡和地方文化脈絡相交織的各種印記。透過不同層面的村落歷史鏡像，區域社會文化發展的獨特歷史過程得以呈現。

本書的村落歷史研究圍繞空間展開，作者指出，「空間不只是一種自然的地理形式人們建構環境的基本要素，它也是人們在此基礎之上不斷建構的結果，它的存在有其社會經濟條件，也是歷史發展的結果」。(頁9)全書在「對村落小寫歷史的描述中，完成對大寫歷史的解構」的學術旨趣之下，圍繞空間與權力、空間與記憶這兩個核心主題展開論述(頁25)，除導言與結語外共有八章。在對三門塘村落故事發生的歷史情境進行鋪陳後，「譜系建構與姓氏空間」、「佛教與村落空間」、「歷史記憶與空間意象」、「力量的空間」、「空間中的物——橋」、「血與土交融的空間」、「是侗非同」等七個主題為讀者展示一幅鮮活的村落歷史畫卷。

明清以來，在木材商業豐厚利潤的驅使之下，清水江下游沿江六個村寨展開「當江」、「爭江」的利益角逐，這不僅促使清水江木材採運內外三江市場機制的生成和最終確立，更對區域內部的社會結構和地方力量格局形成深刻影響。在宏觀歷史的全景式勾勒之後，作者深入分析以岔處為中心的「外三江」微觀木材採運系統與地方「四十八寨」傳統文化網絡之間的關聯。作者更仔細探討以三門塘為中心的「一溪五寨」小範圍支系網絡：在木材貿易經濟的推動之下，三門溪沿岸數個苗侗村寨形成一個區域社會文化網絡，三門塘則是區域市場網絡與地方傳統文化網絡的重疊交合點。同時，中央王朝在「帝國邊緣」地方推行教化以建立正統國家秩序之努力，亦在村寨中留下諸如學館、惜字爐等歷史符號。這些大歷史的印記，深深根植於當地人對過往的言說之中，亦成為本書村落故事展開的敘述情境。

謝、劉、王、吳是三門塘的四大家族，其定居、繁衍，以及在區域內生活、移動所留存的路、橋、井等物化的歷史符號，與族譜、碑文、契約等文字記錄，以及口耳相傳的祖先故事相印證，展現三門塘聚落及與宗族姓氏相交織的村落物質空間格局的形成過程。透過對物質空間營造過程的追溯，可以看到在木材貿易興衰及國家意識形態滲透的情境之下，三門塘人的自我身份認知和鄉土情結得以建構，歷史之於他們的意義亦得以浮現。

相對於家族姓氏空間的封閉性，佛教影響下形成的空間具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清雍正年間至近代，隨着木材商業經濟在村落生活中的滲透，三門

塘人在佛教積德行善價值觀和民間風水觀念的驅動之下修建渡口。這類空間的營造，往往有代表國家力量的官員、宗教勢力的僧人、商號外村人與當地人等多方共同參與，其空間性質因此突破家族界限。不同時代留存的碑銘表明，修建渡口、庵堂這類村落社會事務的主導力量，三門塘曾演繹從僧人寺廟到地方宗族的轉變，「寨前渡口、寨尾廟」的村落空間景觀佈局亦得以形成。

三門塘人對木行興衰的講述與家族歷史相交織，落實到空間分析，作者展示村中作為人們儲存記憶和村落知識的物質空間的兩座風格迥異的祠堂。而融會風水觀念的「船形」空間意象則被人們用以解釋居住空間與家族興衰之間的關聯，推演出「先來先衰敗，落後的居上」的地方勢力演變規律。村寨內原本無分割、無差別的地貌空間因不同姓氏、家族的居住生息而被賦予不同的意義，而與水運相關的沿江地帶尤其是與木材經濟活動密切相關的碼頭、街道更成為權力爭奪的焦點，空間於是具有優越性與邊陲性，村落亦有上下、前後之分別。

村落信仰和象徵層面，作者指出，「在三門塘人的頭腦中，除了一張阡陌縱橫的房舍地圖，還有一張標示着象徵力量的空間地圖」（頁196）。在這張地圖上，聚集在村落某些地方的「邪氣」是可能對人造成傷害的神秘力量。「邪氣」空間本身具有特殊的自然物理特性，但其力量的強弱則是不同姓氏在村落社會中的權力結構與空間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一力量空間的存在合理化村落的內在秩序，村落內人際關係的親疏遠近亦得以區分。安住在村中各個廟宇的「老人家」是為三門塘人帶來庇護的另一種神秘力量。清代以來，因木材貿易活動而勢力不均衡的幾大家族通過建立廟宇開展空間爭奪。進入毛澤東時代後，村落中的力量空間隱退，如今人們又請神歸來。不同歷史情境之下，空間力量可被削弱，亦可被重新賦予，這同樣是家族勢力、國家意識形態、市場邏輯等交互作用的結果。

大量保存的修橋碑銘顯示橋在三門塘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明代以來，不同歷史情境之下的人們懷着不同的信念開展修橋實踐，人們借橋表達對「家族」、「村落」乃至「國家」的認同，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人們的修橋實踐交織着求子保命的世俗意義和修功積德的佛教理念，橋所蘊含的意義亦歷經層累，由最初的家庭之橋演進為村落風水之橋，再到由村內外、士紳、僧人、商號共同參與修建的村落乃至區域公益之橋。這一過程中，國家符號在地方社會逐漸顯現，橋所締結的關係網絡變得更為開放，形式與內容愈加豐富，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超自然之間的意義秩序亦得以締結。

光緒年間的「買橋」事件打破橋一貫具有的家族所有權和排他性，這或許可以看做是商品經濟對地方社會權力格局的一種消解，而人們的價值和物權觀念亦發生轉換。隨着林業經濟的衰退，通往山林的橋失去功用，政府修建的現代化橋樑取代地方性橋，橋的某些根植於地方社會的傳統意義亦逐漸脫落。

三門塘聚落內，居住空間的血緣與地緣特徵構成人們處理日常生活、組織公共活動的原則基礎，這便引出本土觀念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團」。「團」原指血緣姓氏聚居形成的空間範圍，隨着村落中大姓為主、小姓雜居其中格局的形成，「團」成為一個被表述為「住在一塊土，是那一家人」的血土交融的空間概念，其所蘊含的村落組織、儀式、兩性關係被以不同的形式落實到日常情境之中：聚攏飯、「打三朝」、婚宴指向人們之間「不是親戚，又是親戚」的情感狀態；「老人會」則延續以宗族為核心起主導作用的運行機制；女性組織觀音會雖超越血緣、地緣的限制，以情感表述的方式為女性發出日常中的「狂歡之聲」，但其背後的生養生育觀念仍服務於男權主導的宗族觀念；在日常居住的家屋之中，堂屋成為產生凝聚力的神聖位置以及七月半「生者與死者對話」的祭儀場所，而推寒儀式讓人們在約定的時空範圍內共同遵循某些習俗禁忌，家屋空間隨之神聖化，齋戒、堂屋與火塘的儀式，以及被投放江中的收納象徵家內不潔包符的小船，帶走村寨空間的危險與不潔。

在長期的村落生活中，三門塘人的時間觀念遵循自然節律，日常中穿插着富有地方文化內涵和家族歷史的節日，歌聲中演繹着愛情、婚姻與性別權力。在當代旅遊開發的推動之下，人們開始重新詮釋村落景觀，將村落空間知識形塑成文化資源，日常飲食、節日、女性形象等亦被作為「北侗」文化的表徵被強調。明清以來三門塘人孜孜以求的以創造各種符合國家正統文化的歷史而改變自身邊緣境遇的努力，和當下為迎合旅遊市場需求而強調「民族特色」的「異文化」身份塑造，形成一種「歷史的悖論」。面對這一「悖論」，當地人給出一個「是侗非侗」的模糊情感認同，是他們在現實利益情境下對本民族文化的理性訴求。

「清水江文書」廣為人知，但作為一個學術概念的「清水江研究」卻絕非新材料使用所能標示的，這是一種「其來有自的學術理念傳承發展的研究實踐，是圍繞共同主題而研究取向路徑各異的系列工作成果，也是在特定地域範圍內密集佈點開展深入田野調查同時充份兼顧歷史文獻收集解讀的研究範式探索」（頁 ii）。本書所使用的材料除契約文書外，還包括文字化的地

方志、族譜、碑刻、文史資料和非文字化的口述歷史、物化符號等。這些材料不僅僅置入田野現場進行解讀，還被落實到村落空間與日常生活，國家、市場這兩種缺乏溫度的地方社會塑造力量，在地方人群的日常生活與喜怒哀樂中被細緻呈現，對人們情感世界和性別問題的關注則顯示出女性學者獨到的細膩特質。

本書更加值得稱道的是其反思性和寫作方式。一如作者所言，「歷史人類學是對歷史本質的反思，這包括以異文化、他者的歷史觀點來質疑本文化、自身的歷史概念，也體現為人類學的文化論與歷史學的過程論的協調」（頁306）。深入的田野工作使得研究者很自然地立足當下去審視歷史，而去追尋歷史之於地方人群的意義，進而反思我們自己對「歷史」的理解。這樣的理念之下，看起來頗為僵硬的「空間」成為一個歷史敘事方式，其概念亦得以延展。在寫作方面，作者聲稱：「既然不可能在歷史與文本之間『製造』出一致，那麼便從缺失出發，努力來呈現一切。」（頁299）歷史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常常讓研究者陷入困惑，傳統史學研究孜孜以求的「真相」更是撲朔迷離，以至有學者轉而關注幫助我們理解歷史的「凹凸鏡」（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15）。因此，本書作者拒絕採用線性運動的時間序列為書寫歷史的方式，而以多元的視角呈現不同的「歷史的鏡像」。

吳曉美

吉首大學法學與公共管理學院

付海晏，《北京白雲觀與近代中國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305頁。

北京白雲觀作為全真龍門的祖庭，在道教史上地位顯赫，並且歷來受到各方高度重視，20世紀20年代以來有諸多學者對之進行研究。然而對於近代白雲觀而言，仍有不少黑洞值得深究。付海晏歷經十年深耕，完成《北京白雲觀與近代中國社會》一書。此書以作者所盡力收集到的近代白雲觀史料檔案為基礎，力圖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放寬視野，更全面地探究白雲觀在近代中國社會的角色和豐富面相，更深入地審視近代中國政治、宗教與社會間的複雜關係。